

立时代潮头 发思想先声

编者按: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崇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就一定能够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不辱使命。

在此,我校学者浅谈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心得,并就如何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加快推进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与发展建言献策。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品格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李明



近日细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倍受鼓舞,亦颇受启发,尤其对长期因心虑而切己体察的何为学者或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内在品格问题略有心得。

1、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忧患意识

现代大儒徐复观曾以“忧患意识”标识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质。这种与耶稣基督意识、佛教无常意识殊途异趣的忧患意识不仅是中国文化发生、发展的根本动源,而且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纽带,并具体表现为民族集体性的存亡意识、自觉意识、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和道德意识。它既同时指向形上诉求和世俗关怀而表现为超验与经验、理想与现实的互通圆融,又同时关照公共福祉和个人价值而表现为群体与个体、他人与自我的交融互摄。从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体验、理性自觉、道德情怀、生命情调和价值理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塑造了中华民族尤其知识分子深怀忧患和强烈的使命感。所以自古以来,无论历史的进程如何波折、时代的境遇如何艰险,中华民族从来不乏忧道、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仁人志士。以至于徐复观面对中国文化近世以来的历史遭遇曾深情而自信地讲:“中国文化是在忧患意识中成长出来的文化。它必定在忧患最深,忧患意识最强的祖国乡土上,重新得到发育滋长。”(徐复观:《徐复观文集选萃》,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198页。)今天,这种忧患意识也浸漫于习近平的系列讲话之中。其中关于当前国家实力结构软硬失衡、国家发展失调、民族历史失记、价值取向失真、人际交往失信、人事活动失道、道德修养失检、精神生活失贞、哲学社会科学发失力、马克思主义“失语、失踪、失声”以及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自信力、说服力、影响力、认同度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不仅是习近平同志的忧患,也应当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忧患。改变这些现状,化解这些危机,正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2、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人文意识

忧患意识本身就蕴含着人文意识;同时,人文精神是人文科学研究的灵魂,所以自觉的人文意识就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又一品格。具体言之,首先要有以人为本的价值关切。习近平强调“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讲话》),并以历史眼光、世界性视野和人文主义情怀指出:“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同上)其次,要谨防科学主义的警变,保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独立性。近代以来,随着科技理性昌明,科学取得了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可谓世界形态的改造者和人类生活的守护者。然而,由此产生的科学主义观念却深入人心、甚嚣尘上,并以科学方法万能论、科学语言一元论无限推行政物的、数理的、机械的原则,漂亮词语、僵滞生命、萎靡情趣,从而不仅消融和消解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意味,而且加重了人的疏离与精神危机。因此志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学者,必须自觉的人文意识维护其独立性。最后,要反对物本主义,保持崇高的精神追求。哲学社会科学固有其宏大的精神理想和崇高的价值取向,而学者亦当自觉将其内化为主观精神,以此主宰自然生命力,并激发不息的创造力。既要推扬鸿章之义,又要身体清高之行,从而才能避免溺于于欲壑、困思于物化。但不但要警省科学主义的“观念上之物化”,还要物化物质享受的“生活上之物化”(唐君毅语)。这种人文意识在观照哲学社会科学活动及其成果的同时,亦能滋养人的精神生命和自然生命,以保持高洁的精神品味和人生姿态。

3、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主体意识

治学须有主体性,而民族意识就是其具体表现之一。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和精神品格、文明素质”(《讲话》),这就意味着民族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属性。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品格就是其所生存其间民族文化性格。”(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所以在具体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学者应当自觉地坚守民族立场,体现民族身份身份,树立民族形象,彰显民族气度。正如现代大儒唐君毅所言:“中国之复兴,首赖知识分子在学术文化思想上之自作主宰之气概之建立。”同时亦当有“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的信念。只有具备这种民族意识和自作主宰的气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才有担当积极开拓中国文化之前途这一历史使命的勇气和魄力,也才能“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讲话》)。主体性还表现为创新意识。民族精神固然是学者的根本,民族特性是其学问的性格,民族传统是现代学术的精神血脉,我们自当贵无旁贷地传承赓续,但任何“薪火相传、代序守护”的真义,都要靠学者把握时代精神以“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才能担当历史使命。就是说,“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同上)。这也是人类主体历史的发展逻辑和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内在要求。可以说,“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同上),通过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以强烈的主体意识,对传统文化进行富有时代意义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彰显其普遍价值和时代生命力。由此可见,一个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民族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与时代原创能力的实际强度,就决定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命运、文化个性、思想高度、实力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族气度。正如现代大儒唐君毅所言:“中国之复兴,首赖知识分子在学术文化思想上之自作主宰之气概之建立。”同时亦当有“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的信念。只有具备这种民族意识和自作主宰的气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才有担当积极开拓中国文化之前途这一历史使命的勇气和魄力,也才能“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讲话》)。主体性还表现为创新意识。民族精神固然是学者的根本,民族特性是其学问的性格,民族传统是现代学术的精神血脉,我们自当贵无旁贷地传承赓续,但任何“薪火相传、代序守护”的真义,都要靠学者把握时代精神以“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才能担当历史使命。就是说,“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同上)。这也是人类主体历史的发展逻辑和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内在要求。可以说,“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同上),通过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以强烈的主体意识,对传统文化进行富有时代意义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彰显其普遍价值和时代生命力。由此可见,一个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民族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与时代原创能力的实际强度,就决定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命运、文化个性、思想高度、实力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4、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开放意识

治学固然贵专,但也要博观。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同上)这就要求学者当有开放的胸怀和宏阔的视野,不止有民族主义情结,还要有世界主义情怀;不止有主体意识,还要有包容意识。正如习近平所言:“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们发展大历史中去看。”(同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把自己的胸怀、眼光和思想面向世界开放,面向历史开放,“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国内看……又向外国看……既向前看……又向后看”(同上),才能以博大的人类情怀、宽广的世界视野、深厚的历史眼光横贯中外、纵通古今,借鉴一切历史经验,揽尽一切文明成果,包容一切学术观点,利用一切学科资源,会通一切思想智慧,同情一切价值理想。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以化解全球性危机,挽救人类的共同命运。也只有这种开放意识和包容意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才可能生发人类性的终极关怀。

5、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须有笃实精神

笃实精神表现在做人上就是敦厚朴实,表现在做事上就是踏实认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仅将“守笃实,戒机巧”(曾国藩语)视为做人的基本信念,而且要求“欲当大任,须学笃实”(程颢语),把笃实精神作为担当大任的内在品格和基本素质——否则“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庄子·天地》)。这种笃实精神对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就是坚守“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贯彻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就是要“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同上)。具体而言,就是踏实而不机巧,谦虚而不刚愎,勤奋而不懈怠,扎实而不浮躁,贵真而不务虚,实干而不空谈。正如习近平勉励青年既要勤学,“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又要笃实,“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只有笃实精神,学者才能淡泊明志,耐得寂寞,锐意真理,创造价值,其它品格才有真实的根基;只有笃实精神,民族精神才能昌明,国家实力才能强大;也只有笃实精神,人类社会才得以进步,人类文明才得以发展。

文化自信与“古今——中西”问题之辨

校纪委书记 罗新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过程中必须要有坚定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尊重、认同和继承,二是对外来文化的消化、吸纳和包容。近代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中,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始终围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即如何看待古今问题和中西文化问题。在学习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之际,有必要对“古今——中西”问题作一辨析,许会对今日坚定文化自信有所裨益。

“古今——中西”问题之辨

“古今——中西”文化大辩论源自上个世纪或更早一些。郑观应在1894年的《盛世危言》中指出:“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上个世纪初叶,中国面临着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五四运动全盘接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吸收西方文化都是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选择。

新儒家代表马一浮认为:“国学者,六艺之学也”,“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绝,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胡适则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用“西学”来统御“中学”,重构中国的学术体系。梁漱溟认为:“第一步的任务,是全盘承受西方文化,这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不得不全盘承受它,接下来,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再未来是印度文化的复兴。”冯友兰先生在1930年曾言:所谓东西的问题不过就是古今的问题,古今的问题就是走向现代化的问题。陈来则认为:“古今不是唯一的理路,不能把东方文化完全看成传统文化,把西方近代文化看成现代的普世价值,就价值来说,东西方两种文化都有普世价值,不能把二者概括为古今问题”。由此看来,“古今——中西”问题是一个事关民族国家现代化的现实问题。

上个世纪,中国从贫穷积弱起步,要建设现代化的民族国家。钱宗武认为:“自汉唐至明清,中华文化一直保持着强劲的正能量,辐射区域广泛,影响力强大”。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经历剧烈变革的阵痛,仁人志士为求救亡图存之策,“西学东渐”。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倡导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自上个世纪以来,中西方文化产生剧烈碰撞,西方思想文化科学知识大量涌入。时至今日,“中西”文化之争仍未有停息,究竟是“西体中用”还是“中体西用”?这一争论依旧反复在人们的脑海中中涌动和纠结。例如,在大学课堂上的“原版西方教材”之争,就是中西方文化之争的一个缩影。可以说,20世纪大多半的时间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有批判否定的态度。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及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国民的文化心理日趋改变,“国学热”的现象也随之出现。“国学热”现象的本质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和价值的回归。中华民族主体价值观的回归使人们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推进民族国家现

代化的强大正能量。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悄然发生巨大的转变。这种文化自觉和价值回归增强了文化自信,激活了文化生命力,振奋了民族精神。

文化自信与“古今——中西”问题

“西学东渐”以来,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古今——中西”问题,是事关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大问题。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要做到继承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要对事关国计民生、国家现代化和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妥善处理“古今——中西”问题,便不可回避。

1、“师古”、“随时”与传承创新

《增广贤文》有云:“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对于“古今”问题的态度及对当代国家现代化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回应,唐朝李翰之言可能最恰如其分。李翰在为杜佑《通典》撰写的序言中有云:“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既要“师古”,又要“随时”而顺应时代之变。“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经邦致用,从“立事”开始,也是问题导向之。“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

钱穆言:“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经学乃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中国学术体系的源头。1947年版《辞海》指出:“研究经传、诠释训诂、剖析义理、谓之经学”。经,指经文本,经学则指经、注、疏。经学的生命力在于历朝历代学者对经书义理的剖析和对经书不断地现实诠释。经书和注疏相得益彰,构成了历久弥新的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正如戴国所云:“学术精神依赖文化经典的创造,经典之再生,又促进学术思想不断衍生”。钱宗武指出:“历史的发展进程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强的增殖能力和调节能力。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文化变革和价值转换,都与经典的重构及诠释的重建紧密相关”。中国传统文化超越时空、生生不息的传承。中华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向心力,使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直至今日。“文明使人类的灵魂世代相传”。传统文化是维系国家统一、多民族和谐相处的基石。在当前继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增强文化自信,又要防止主观曲解经典,或食古不化,以及对现实问题避重就轻的问题。

2、普适价值和文明共享

西方文化一非洪水猛兽,二非全是普适价值,大可不必一概排斥,或于全面接纳。曾亦、郭晓冬认为:“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制度价值化身为全世界的普世价值”的思潮大于西方世界。国内亦有少数学者将西方流行政治制度模式化身为“唯一真”模式,引起广泛争议。“唯一真”的意义就是只有一个“真”;“唯一真理”就是只有这条道理才是真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一元”的普遍性观念源自西方基督教文化,而中国文化的基因历来主张包容、和谐、多元。市场经济乃法治经济,宪政乃是法治的基础,毋庸置疑。应该质疑和批判的是:西方现

行政治制度价值是“唯一真”的普世价值吗?梁鹤年指出:“西方的确有许多令人艳羡的成就,但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多重原因互动的结果,一窝蜂地模仿不是出路,观察、反思然后创新,或可找条生路”。陈来认为:“东西方两种文化都含有普世价值”的成分。习近平同志在第70届联合国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只有全人类共同认可的普世性价值才是共同价值,只有全人类形成共识的共同价值才是普适价值。一国的政治制度乃长期历史演进的结果,“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威尔·杜兰特夫妇在《历史的教训》中指出:“历史就是各色盲,任何肤色的人,都可能发展出一种文明(只要环境适宜)”。文明并非罗盘永远指向一方,繁荣也不可能久驻一地。任何以“唯一真”普世价值强加于别人,都是不能接受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们应该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文化自信需要开放、包容的心态,承认中西方文化当中有许多共同价值的成分是普适的。事实上,中西方文化当中任何普遍性价值的方面都是值得互相学习和借鉴的,中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都应该为全人类所共享。

3、文化自信与“扶元固本”

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在中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体,西方先进的理论观点和优秀的学术成果为用。一是要批判地吸收西方理论成果,正像马克思主义批判吸收古典哲学、空想社会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成果的态度一样,兼容并蓄。二是要将西方最新理论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化”。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大潮推动下,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冲击。人们都在自觉或不自愿地接受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继承是文化自信的彰显。对西方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价值的消化、吸收、包容、接受并丰富自身文化亦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人类共同价值观只有与不同民族的道德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才能在人们的精神世界扎根,被人们所接受并付诸道德实践”。在探讨“古今——中西”文化之时,我们经常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事实上,文化乃一整体,精华与糟粕往往杂陈相间,不易分割。对待外来文化以及传统文化在吸纳和继承过程中,都要“扶元固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分析和判断,增强自身文化自信,提高免疫力,以文化自信为统领,正确处理好“古今——中西”问题,努力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汪世荣,男,1965年生,中共党员,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助理,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院长,2014年获得“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7—1949)》(作者汪世荣、刘金城、王吉德、李娟)于2010年入选首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出版说明》强调:“入选成果”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成果出版后,先后获得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三等奖。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原卷宗保存于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保存有复印件,编号15全宗,共计1733卷。陕西省档案馆保存的革命历史档案共计

58个全宗,19488卷,可以用“数以万计”来形容。这些档案的保管、利用、整理和研究,目前是学界引人注目的“公案”之一。因为这批数量庞大的档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放后,极大便利了学界的研究。但是,2010年国家档案馆一纸《通知》,暂停了这批档案的查阅,迄今为止,“冷冻期”业已持续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明确规定了未经公开的档案其使用的途径与方法,而已经公开的档案被暂停查阅,这种超出立法者想象的行为,成为了法律调整的“盲点”。虽然档案“利用难”是最近5年全国两会热议的话题,但档案利用并非像结婚生子那样关系到每一个人,依法行政的春风,何时能够吹拂到档案利用这一偏远的玉门关,如何让学者们望档案兴叹,着实是繁荣和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绕不过的难题。

档案馆是法律史学研究的“矿山”,档案是法律史学研究的“矿石”,人们常说案件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冤假错案

的复查,实际就是审查司法档案,对审理活动的程序、据以定案的证据、判决结论的分析推理逻辑,进行还原和评估。无论司法人员是一丝不苟还是故弄玄虚,案卷均以其特有的细节无情地予以呈现。历史是一面镜子,是因为案卷作为司法活动过程和结果的完整记录,属于国家财产,永久保持并且强制开放。档案的利用与开放,就是现代国家实现民主管理的重要手段。既然档案必须公开,相关决策人员就应对此心存敬畏。

正是借助利用陕甘宁边区司法档案的便利条件,我校法律史学科的老一辈学者杨永华、方克勤等教授,较早开始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取得了学界公认的学术成就。对庞大的司法档案进行系统分类,对典型案例进行细致梳理,呈现陕甘宁边区司法过程的细节,成为剖析不同观点、深化研究领域、揭示司法运作规律的不二法门。司法档案的整理,除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外,还面对着诸如档案管理部门“对开放与利用关系的把握,保

管与服务方式的改进,涉及到诸多复杂的环节。如果将司法档案作为研究的“源头活水”,研究成果只有立足于扎实的档案整理和利用,始能保证其应有的品质。项目组关于司法档案的持续关注,为我校陕甘宁边区法律史学领域保持全国优势地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史学即史科学。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建立在全面、系统、科学利用司法档案基础上的研究成果,自然让人耳目一新,开卷有益。

